

市场经济与怒族社会生计转型^{*}

——以怒江峡谷秋那桶村为例

□ 温士贤

[摘要] 通过对一个怒族村落的个案研究发现,怒族社会在相对封闭的峡谷环境中发展出一套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体系。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村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市场体系之中,其原有的家计经济正在逐步遭到瓦解。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怒族社会的生计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型。现在,人们要通过将当地资源商品化以及外出打工等“找钱”方式来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

[关键词] 怒族社会;家计经济;市场经济;生计转型

[中图分类号] C9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4)01-0094-07

O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Nu People's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Qiunatong Village of Nujiang Valley

WEN Shi-xian

(Guangdong Institute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180, China)

Abstract: In a case study of a Nu people's village,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Nu society has developed a self-sufficient livelihood economy system in a relatively closed valley environment. However,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villager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volved in the market system and their traditional livelihood economy is gradually falling apart. Under such a marketized social circumstance the Nu people's livelihood system begins to transform. Now villagers have to commercialized local resources and go out for work to earn a living.

Key Words: the Nu people's society; livelihood economy; market economy;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群体的经济生活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人类学家很早就关注到初民社会的生产、交易、分配、市场和全球化等方面的内容,并以学科的文化整体观构成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批评。大量的民族志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原则是多样的,每个社会群体都会根据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创生出一套经济组织原则。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将19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经济组织原则划分为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三种,并认为,为自己需要而生产的家计原则“注定

要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1](P16)}可以说,家计经济是前工业社会的重要生存法则。然而,自19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大行其道,尽管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这种趋向竞争的市场经济不能覆盖全部经济。”^{[2](P231)}但家计经济却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和瓦解。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少数民族群体无法再维持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甚至生存危机已经摆在一些民族面前。那些自给自足的弱小群体如何应对外部世界的迅速变迁?他们的家计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会做出怎样的反应?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异地就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0BMZ054);国家民委项目“西部省际结合部民族地区的内发型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2-GM-038)。

关注的问题。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化生存语境下,少数民族群体并没有固守传统的家计经济,而是运用各种策略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来。黄应贵对台湾东埔社布农人的研究发现,布农人通过将“农业商业化”的方式接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3](P67~84)}秦红增、韦茂繁等人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群体借助相关扶持政策,通过发展现代种养业,实现由家计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4]而对生存于怒江峡谷深处的怒族社会来说,他们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有利条件,同时地方政府也不具备相应的财力对其进行扶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

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选取怒江峡谷深处的一个怒族村落——秋那桶村进行田野研究,以期从中发现怒族社会在市场化进程中遭遇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的应对策略,进而可以对当前的市场经济行为做出一定的反思。

二、峡谷环境中的家计经济

历史上,怒江峡谷曾是一个笼罩着死亡阴影的神秘峡谷。险峻的峡谷,奔腾的怒江,特别是浓烈的瘴气,使得内地的汉族人对怒江峡谷一直心存恐惧。在美国旅行家盖洛(William Edgar Geil)看来:“自威尼斯旅行家马克·波罗的时代以来,人们对这一险峻的山谷就一直心存恐惧,使它变成了邪恶的代名词。”^{[5](P248)}然而,怒族人却世代生存于此,他们将险恶的怒江峡谷视作生存的乐土,并利用峡谷中的各种资源维系着自身的生存发展。本文所调查的秋那桶村地处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境内,隶属于该县的丙中洛乡。秋那桶村是怒江峡谷最北端的一个村落,北部与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龙乡接壤。该村下辖十个村民小组,^①共有人口 295 户、1 274 人,平均每个村民小组 100 余人,户数不足 30 户,其中,绝大多数人口为怒族(其中间杂着少量的藏族和傈僳族人口)。怒江峡谷中的村落面貌与马克思描述的 19 世纪法国农村状况非常类似:“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足自给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6](P217)}怒江峡谷中的每个村落、每个家庭都近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他们竭力从其依存的生态环境中获取生活资料,进而发展出一套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体系。

1. 作为生存基础的混合农耕体系

怒族社会在 20 世纪初由刀耕火种过渡到定居农耕,可以说,土地是他们生存的根基。秋那桶村的十个村民小组共有耕地 3 494 亩,平均每户约为

11.8 亩。村民将他们的土地分为牛犁地与锄挖地两种类型,牛犁地即为可以用耕牛犁作的土地,那些海拔较高、地势陡峭、无法用耕牛犁作的土地为锄挖地。实际上,秋那桶村民的土地大部分为锄挖地,牛犁地仅限于村落附近的一些平坦土地。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和光热资源,人们在不同类型的土地上采取了不同的种植制度。

在牛耕地上,人们采取了苞谷——小麦复种的种植制度。在四五月份春小麦收获后,即开始播种苞谷,到秋季的九十月间即可收获苞谷,待到十月底播种小麦,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牛耕地土壤肥沃,作物产量也相对较高,苞谷亩产在一千斤左右,小麦的亩产有四百斤左右。可以说,秋那桶村民的粮食收获大部分来源于牛犁地。锄挖地土壤贫瘠,加之气温较低,难以维持一年两熟的复种制度,而是实行苞谷—小麦(或青稞、蚕豆)—荞麦两年三熟的种植制度,即第一年种植苞谷、小麦(或青稞、蚕豆),次年四五月份小麦(或青稞、蚕豆)收获后,待到七月底种植荞麦,依此循环。锄挖地虽然产量低,但大面积的播种也能带来不错的收成。通过对农业种植制度的合理安排,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其粮食产量也获得大幅提高。

对秋那桶村民来说,农产品的生产并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养活人口和牲畜。村民们所收获的粮食除酿制水酒外,大部分是用来喂养猪、牛等家畜。实际上,在封闭的峡谷环境中,农产品的出售并非易事。因此,村民们选择了将农产品在家庭内部就地转化——即通过饲养猪、牛等牲畜,将剩余的粮食转化为人所需的肉类蛋白和农业生产所需的肥力与畜力。在秋那桶,人们对牲畜的饲养极为重视,几乎每家都养有猪和牛。笔者在 2009 年调查统计,秋那桶村的青那组、嘎干塘组、初岗组、贡卡组四个村民小组 140 余户共养猪 692 头,平均每户养猪约为 5 头;养牛 718 头,平均每户约为 5.1 头。养猪不仅是为了获取肉食,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取农家肥。在每年的 1 月份和 8 月份,村民要往猪圈中添加大量的草木枝叶,枝叶与牲畜粪便混杂在一起,经过几个月的发酵便成了农业生产所需的农家肥。猪圈成为农田肥料的来源地,在村民眼中,猪圈就是一个小型的肥料加工厂。正是由于农家肥的大量使用,才使得土地损耗的肥力得到及时补充。与猪相比,牛的积肥作用是次要的。然而,和农事活动最为密切的家畜便是牛,犁翻土地和播种都需要耕牛来牵引。

^① 此十个村民小组为:青那组、嘎干塘组、初岗组、贡卡组、那恰洛组、尼打当组、石普组、雾里一组、雾里二组和碧旺组。

可以说,牛已成为秋那桶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动力。

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在分析法国农民时指出:“杰出农民的全部艺术在于能够尽可能地发挥种植业和饲养业的作用,把他们并入进同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类生产中在别人看来的副产品,并通过各种精巧的计算,使人们在恶劣气候和收成不均的情况下具有生活保障。”^{[7](P47)}秋那桶村民正在娴熟地运用着这项生产技术,如果以孟德拉斯“杰出农民”的标准来衡量秋那桶村民的话,那么无疑他们都可以被称作“杰出农民”。

2. 作为生计补充的乡村手工业

在传统怒族社会,每户家庭都力图做到自给自足,因为对他们来说,缺少现金购买商品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同时,由于乡村市场发育不健全,人们也无法及时地从市场上获取他们所需的物品。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传统的中国农民大多是身兼农夫与工人的双重身份,除了进行农事活动,“每个自给单位,家庭、村落,或是庄园,必须经营着一些基本工业,不论如何简单,用来满足他们生活上的需要”。^{[8](P198)}实际上,市场和商品在怒江峡谷中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村民们在相对闭塞的峡谷环境中发展出编织、纺织等手工技艺。

对于怒族社会的编织与纺织技艺,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清乾隆年间余庆远在《维西闻见录》中记载:“怒子,居怒江内……人精为竹器,织红文麻布,屢些不远千里往购之。”怒族男子擅长编织,怒族妇女则擅长纺织。村民们日常使用的背篓、簸箕、囤篓、竹筛等器具,均是由村民自己编织。而妇女们的纺线织布活动不仅对个体家庭,甚至对整个怒族社会的生存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怒江峡谷中物资匮乏,人们所需衣物及铺盖均是由妇女纺线织布制作而成。在以前,“从绩麻、捻线到做成一条裙子,约需二百多个小时的劳动。妇女们不论走路、舂米,都手不离麻。整年辛苦劳动,一家人还很难都穿上一件麻布衣”。^{[9](P6)}可以说,一家人的冷暖全系于妇女之手。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大量商品涌入涌进怒江峡谷,现在人们的衣服、被褥几乎全是从市场上购买。虽然妇女们还是像惯常一样,每到农闲季节就纺线织布,但这更多的是对传统惯习的一种延续,而非生活之必需。

这些传统的手工制品不仅满足了自身的生存需求,同时村民们也可以此与外界进行交换,获取他们不能生产的物品。除了编织竹器和纺织麻布外,秋那桶村民以前也曾制作一些简单实用的木器。直到20世纪90年代,村民自制的木勺、木碗、木桶、木量筒等器具仍在大量使用。但在此后短短的十余年

间,这些曾普遍使用的木器便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各种瓷碗、铝盆、铁盆和塑料桶等器具。面对市场上丰富的现代商品,村民们很快放弃了自己的手工技艺与手工制品。市场经济的演进在无形中将生产与生活,将生产者与消费者,将生活方式与生存环境剥离开来,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逐渐被打破。也许正如卡尔·波兰尼所预料到的,“最后,经济的自给自足仅仅是一个既存的封闭群体的附属特征而已”。^{[1](P50)}现在,村民们的大部分生计活动都要围绕市场来展开,并通过市场来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料。

3. 以物易物的地方交易体系

从村落内部来看,怒江峡谷中的每个村落都是一个自给的小社区,他们可以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中生存下来,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未完全达到自足的状态。在物资短缺时,他们不得不与周边的村落和民族进行交易,以换取维生物资。

秋那桶村民每到粮食短缺之时,就要背着自己制作的麻绳和麻布,沿怒江茶马古道进入到西藏的察瓦龙境内,与松塔和龙普的村民换取粮食。察瓦龙境内的松塔和龙普是两个怒族村落,在地缘上与秋那桶邻近。松塔人擅长编织箩箩,龙普人则擅长烧制陶器。遇到饥荒之时,松塔和龙普的村民也会背着他们制作的箩箩、陶器到秋那桶换取粮食。现在秋那桶村民使用的箩箩,多是前几年与松塔村民交换所得,一般来说,一个箩箩可以换到30斤粮食。龙普人制作的陶器在秋那桶非常受欢迎,一个大陶罐可以换50~60斤粮食,一个陶锅则可以换十多斤粮食。有些察瓦龙人则是从西藏盐井背盐巴下来跟秋那桶村民换粮食,通常1升盐巴可以换取四五升粮食。

从察瓦龙到秋那桶一路翻山越岭,松塔、龙普的村民背着箩箩、陶器过去换粮食颇为艰辛。秋那桶村民对他们十分同情:“以前粮食少,我们自己都不够吃,他们来换粮食我们还是会换给他们。他们需要养子,我们需要箩箩、陶罐,我们上去换粮食他们也会换给我们,大家相互照应嘛。”可以说,正是这种互通有无、相互照应的以物易物行为,才使他们能够度过饥馑。

直到十几年前,秋那桶与察瓦龙之间的以物易物活动仍很频繁。随着交通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这种以物易物的地方交易体系最终走向瓦解。面对社会的巨大变迁,一些老人不禁感叹道:“现在松塔人富了,松茸菌一有价格,人们全都去找松茸,编箩箩的也少了。龙普人的陶罐也没有以前的好,现在龙普年轻人做的陶罐不结实也不好看。现在国家生产的水桶多、口袋多,价格也便宜,箩箩、陶罐这些东

西都不用了,也没人去换了。”

三、市场魅惑下的现代消费

在国家力量和市场经济的合力推动下,怒江峡谷早已不再是封闭、孤立的化外之地。市场经济诱使人们走出自我消费性生产,原本自给自足的秋那桶村民被裹挟至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体系之中。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可以避免对市场造成依赖,那么,为什么那些有着自给自足经济体系的民族要参与到市场活动中去?美国人类学家里卡多·戈多伊(Ricardo Godoy)等人从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推力方面,内部人口压力、外人入侵可能是土著居民参与市场经济的原因;在拉力方面,提高食物的消费水平、减少食物消费的不稳定性和外部商品的诱惑,促使土著居民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来。^{[10](P157~158)} 这种分析框架与中国少数民族的境遇颇为吻合,对怒族社会来说,正是由于内部物质匮乏与外界商品诱惑的双重动因,才促使他们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来。

1. 衣食消费的市场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已离人们远去。在基本的维生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又产生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现在,秋那桶村民对市场上的商品有着强烈的消费欲望,他们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几乎都要从市场上购买。以衣物消费来说,在20年前,村民所穿衣物尚是自己纺织的麻布衣物,现在市场上的各种衣物将其取而代之。一些老年妇女还在穿着怒族的传统服饰,但这些传统服饰也多是市场上购买。各式胶鞋成了人们登山、劳作的最好装备。在丙中洛商店中一双胶鞋价格在15元左右,一年中每人都要穿坏五六双胶鞋。年轻人则喜欢穿着时尚的牛仔裤、T恤衫、运动鞋、皮鞋等服饰,从他们的衣着打扮已很难看出他们是遥远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秋那桶村民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中,村民们的食物主要是自己生产的苞谷、小麦、荞麦等作物,肉食来源则是他们自己腌制的琵琶肉。现在,从市场上购买的大米成为秋那桶村民的主食,而他们自己种植的粮食则是用来酿酒和饲养牲畜。秋那桶村民回忆到:以前主要是吃苞谷饭、吃荞子饭,大米饭是一点都没有,有的人家连苞谷都吃不起,要和蕨菜揉在一起做粑粑吃。以前买大米要粮票,只有干部才有一点,不是干部的话,大米一粒都见不到。到过年时我们要背上荞子到丙中洛去换一点稻谷,稻谷换回来后再自己舂。现在人们都是买大米吃,

家家都是吃大米饭,特别是小娃娃们挑食的很,只吃大米饭,苞谷饭是一口都不吃。

饮食结构的不经意转变,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笔不小的经济开支。就一般的四口之家来说,一个月内至少要消费掉50斤大米,人口较多的家庭则消费得更多。在丙中洛市场上,一袋50斤的大米价格在一百元左右。我们可以简单的算出这笔账,即一个普通家庭每年在大米上的消费约为1200元,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无形中摧毁了秋那桶村民自给自足的食物供给体系。在西敏司(Sidney W. Mintz)看来:“现代饮食模式演化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劳动者们乐于加倍努力地工作,为了能挣到更多的钱——从而消费更多。一种新的商业精神察觉到了劳动者们这种欣然就范的特点,而把这视为是一种值得鼓励并能加以利用的精神品质。”^{[11](P177)} 的确,秋那桶村民就是这样欣然就范的,饮食结构的改变使他们更深地卷入到市场体系之中。

2. 由“虚假”到“真实”的现代消费

市场和市场上的商品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村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那张单薄的纸币上所承载的价值。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村民们的物质需求也随之增长。除了在衣食方面的基本生存需要,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手机等现代商品,也竞相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

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年轻人,在有了现金收入之后,经常购买手机、摩托车等象征身份与地位的商品。2006年,秋那桶的村组公路刚刚修通,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就迫不及待地购买了摩托车。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摩托车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实际的用途,购买摩托车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时尚和显示自己的经济能力。在普通村民眼中,“只有那些有钱人、在外面工作的人才买得起”,购买一辆摩托车可能要花费一个家庭一年甚至几年的积蓄。有些年轻人为了面子跟亲戚借钱也要买摩托车。村民LZY跟笔者讲到他侄子为买摩托车向他借钱的经历:我们村这几个年轻人有了摩托车更是疯了起来,到晚上一两点钟还有摩托车嘟嘟响,一会下去一会上来。我那个侄子看到别人买了摩托车坐不住了,也想买,想买还没钱,于是就跟我来借钱。我跟他说买摩托车有什么用,用得到买才行。他说要做生意,收松茸菌、收药材。为跟我借钱,他来我家跑了三趟,最后不得不借给他1000块钱。钱借给了他,他花两千多元买了一辆二手车回来,可没几天车就坏了,下去修又花了三四百块钱,最后连修车的钱都没有,又来跟我借。现在那辆破车就放在家里放起,生意没做成车也不能骑。

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现代商品深深地吸引着大山中的年轻人。在 2009 年的时候,手机信号尚未覆盖秋那桶,即便如此,村里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有了手机。这些年轻人一闲下来就摆弄手机,走路时用手机播放音乐。村里时尚的年轻姑娘更是喜欢走路时戴着耳机,听着 MP3,年轻人不断地以这些所谓的“现代”商品来武装自己。现在的怒族人,与他们“原始”“落后”的形象渐行渐远。市场上大量诱人的商品使人们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需要,哪些是虚假的需要。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曾批评道:“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12](P6)} 这些虚假的需要是在外界影响和支配下产生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把这种虚假的需要转化成一种真实的需要。最后,人们不得不为各种真实的或虚假的需要而努力工作。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村民们带来了丰裕的产品和便捷的生活,但同时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货币不是每天都要用的。现在,情况不同了,‘手里必须总是握着钱包’。为了购买家庭和经营的必需品,农民必须出售东西,不管价格是好是坏。”^{[7](P68)} 这为村民们的生计带来新的困境,乡村生活的市场化,迫使村民必须改变传统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去“找钱”。^① 现在,“找钱”成为人们每天都要思考的事情。

四、市场环境中的生存策略

通过细心地经营土地和牲畜,秋那桶村民获得了充足的粮食供给。但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中,人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现金,而不是更多的粮食。秋那桶村民清醒地认识到,农业生产无法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现金收益。因此,他们放弃了从农业系统中寻求摆脱生存危机的可能性,而是向农业体系之外去寻找新的“找钱”机会。山地中的各种资源再次成为他们谋求生存的选择方案,通过将山地资源商品化,人们获得了参与市场的机会。与此同时,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则义无反顾地走出大山,进入到城市工业体系中谋求生存。

1. 山地资源的商品化

挖药材是秋那桶村民一项主要的“找钱”活动。挖药材可以持续大半年,从春季草木复苏可以一直挖到秋季收获之前。春季的二三月份,村民们便开始在山脚潮湿地带采挖一种叫续断的药材。续断的收购价格不高,每斤 5 角左右,多是妇女和孩子采

挖。续断的价格虽低,但在村落附近山脚河边就能采挖,多的话一天可以挖 50 多斤,少的也能挖 20 多斤,其获利在 20~30 元左右,对妇女和孩子来讲是笔不错的收入。进入五六月份,村民们开始在附近的山上采挖白芨,新采挖下来的白芨可卖 5 元一斤的价格,顺利的话一天可采挖到 30~40 斤白芨。夏季是采挖黄连、贝母、雪莲等名贵药材的高峰期,每到这个季节,村里的年轻男子几乎全部跑到山上挖药材,背上工具、粮食、睡袋、塑料布,一去就是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

挖药材给每户村民带来的收入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这对贫困的秋那桶村民来说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现金收入。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挖药材是项极其艰辛的劳动,风餐露宿、攀岩附葛,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过度采挖之下,大山中的各种药材资源日渐枯竭。村民们也已意识到药材资源的日渐匮乏,“在以前砍火山地的时候,什么药材都不值钱,那时候山上药材到处都是。这几年药材贵了,黄连、贝母、白芨这些药材都快挖绝了”。市场经济把所有资源都转换为可以交易的商品,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秩序被市场法则所打破,对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屈服于市场的逐利性。可以说,黄连等药材一直是联系怒族人与外部世界的重要媒介。但到今天,联系峡谷内外的山地资源已逐渐枯竭,长此以往,生活于峡谷中的人们将失去与市场角逐的最后筹码。

与挖药材大体同期进行的另一项“找钱”活动是找菌子,找菌子为家庭带来的现金收入仅次于挖药材。怒江山地菌类资源丰富,松茸菌、羊肚菌、牛肝菌、羊杆菌、石木耳、黄木耳等菌类均有出产。以前,这些菌类仅是作为村民们日常食物的补充,很少用于出售。近年来,在 market 需求的刺激下,怒江峡谷中各种菌类的价格迅速走高,村民将找菌子作为一项重要的“找钱”活动。

受市场的操控,各种菌子的收购价格极不稳定。随着菌类产量进入高峰期,其价格则会迅速下跌。以松茸菌为例,2009 年 6 月份最初收购时是 300 元一斤,但那时候松茸菌极少,用村民的话说,“老板都是骗人的,我们从没卖过那个价格,那时候松茸菌找都找不到,等松茸菌多了他们就把价格降下来”。到 7 月初的时候松茸菌还能卖到 100 元一斤,但到了 7

^① “找钱”是当地人常用的一个词汇,它基本涵盖一切能获得现金收入的手段。在秋那桶,人们的现金收入不是通过工作“挣”到或通过经商“赚”到,而主要是在大山中采挖药材、菌子等土特产用于出售。“找钱”一词更能贴切地描述出他们获取现金的方式。

月中旬,松茸菌的产量进入高峰期,其价格下跌到了30元一斤,到7月底8月初松茸菌产量最多的时候价格则跌到了10元一斤。采摘来的菌子必须及时出售,否则很快就会腐烂变质,这就意味着人们在市场面前完全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可以说,菌类的采集和出售完全是在市场的操控下进行的,人们不知道这些产品如何被转手,最终以什么价格被出售,也不知道这些产品将销往何方。秋那桶村民所面对的是一个“失控的世界”,^{[13](P5~6)}村民们对外部世界,对菌类的市场行情完全无法掌控,而只能任由市场推来操去。即便价格再低,人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跑入大山之中去寻找各种菌子,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他们仅有的几种“找钱”途径之一,错过了它,以后一年的生活就会陷入困顿。

2. 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与自然资源一样,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也可以开发利用并转化为经济利益,一些村民学会利用他们的文化资源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怒江峡谷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域,当地政府把旅游业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点产业。秋那桶村地处怒江峡谷深处,是贡山县发展旅游业的重点村落,政府推动的旅游开发为当地村民带来了一些新的“找钱”途径。2008年,贡山县旅游局支持有条件的村民开办家庭旅馆,并为他们提供消毒柜、碗筷、被褥等开办旅馆所用的一些物品。头脑灵活的村民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开办了家庭旅馆。

家庭旅馆的开办为村民开辟了新的“找钱”途径,但它所带来的收入并不稳定。在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假日,游客蜂拥而至,家庭旅馆的客房无法满足游客需求。而到了淡季,可能一两个月都接待不到几个游客,家庭旅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闲置的。即便如此,开办旅馆的家庭每年也能从中赚到几千元到几万元。除旅游业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外,一些村民与游客建立起联系,他们有时会利用这种关系来寻求帮助。秋那桶的几个大学生,读书期间都曾受到过游客不同程度的资助。

但从旅游业中受益的毕竟还只是少数家庭,在当地村民看来,“能开办旅馆的,都是那些有钱的,并且他们都有亲戚在县里当官”。对大多数村民来说,他们只能远远地看着游客的到来与离去,而无法分享到旅游业所带来的利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村落中的一些矛盾也凸显出来。从旅游业中获利的村民很快变得富裕起来,而大多数村民则无法分享旅游业带来的利益。经济收入的不平等,触及了他们“自采集时代演化而来的关于公平的伦理信

念”。^{[14](P340)} 几户开旅馆的人家为拉拢客源,在私下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原本和谐简单的人际关系,开始变得逐渐复杂起来。

3. 进入工业体系谋求生存

与生于大山,长于大山的祖辈们不同,近几年,秋那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峡谷,进入城市的工厂中打工。从贫穷落后的怒江峡谷来到繁华的现代都市,他们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更为紧密,从而也被更深层次地整合到现代工业体系中来。然而,有限的工资收入,枯燥的工厂生活,打破了他们最初的美好想象。用他们的话来说:“每天工作都是重重重复,上班、吃饭、下班,只能过一天算一天!”虽然身处繁华的都市之中,但对这些外来打工者来说,他们只能栖身于单调的工厂宿舍,而无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

秋那桶的LXM在2012年3月份来到广东珠海打工。在此之前,她曾在昆明做过餐厅服务员,每月工资一千多元,嫌工资太低,于是辞掉昆明的工作来到珠海。LXM所在的工厂是一家日资企业,她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做质检员。这家工厂实行底薪加加班费的工资计算方式,工资底薪是1400元,加班费是每小时12元。据LXM讲,她每个月的工资有3000元左右,也就是说,有1600元的工资是加班赚来的,每个月加班时间要超过100小时。LXM跟笔者抱怨到:“现在的工资虽然比在昆明高,但这份工作太辛苦,几乎每天都要加班,不加班就赚不到钱。”工厂要求员工们早上7点钟就要起床,起床后要做早操,8点钟准时上班。为了多睡一会,她们经常不吃早餐,起床之后就匆匆忙忙去上班。中午只有50分钟的吃饭时间,吃完午饭后继续工作。下午5点钟下班,晚上7点钟继续加班。“下班后,第一时间就去冲凉,不然,懒在床上就不想动,很快就会睡着了!”

这是现代工厂中打工者的普遍生存状态。在有着精细分工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中,个体只能在生产线上从事简单、枯燥、重复的工作。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工业社会中的分工体系做出强烈的批判:“在生活的流动性不断增加的同时,文明也带来了更多的一致性,它强迫人类去从事单调而冗长的劳动。各种环境和各种需求可以促使野蛮人从事不同的劳作,但文明人则要委身于一种工作,而且永远是同一种工作,是一种灵活性更小,限制更多的工作。”^{[15](P198)} 在外出打工之前,他们认为,“外面工作再怎么辛苦也要比在家里轻松”,但经过几个月的打工生活之后,被激情和幻象所充斥的头脑开始冷却下来。工业生产和农业劳作有着本质的不同,工业生产是一种单调的、缺乏变化的劳动,而且必须要紧跟

机器的节奏。而农业劳作则可由劳动者自己掌控,高兴时可以多做一点,劳累时可以少做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工厂中的“现代”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生存乐趣,相反,它使这些打工者的生存基础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外出打工成为秋那桶年轻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谋求生存的重要途径,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大多愿意外出打工,而留在村里干农活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表现。当然,这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人都很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并没有机会能够落脚城市,早晚有一天他们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毕竟,年轻的一代已有能力走出大山,并且这些年轻人已经开始思考自己家乡和民族的未来发展与出路。

五、结果与讨论

对处于生存边缘的秋那桶村民来说,他们生存选择的首要标准是收获的可靠性与稳定性,而不是按照市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安排生计。实际上,在环境闭塞、交通不便、市场交易成本极高的山地环境中,村民失去了经济学利益最大化的计算机会。他们所能做到的,唯有利用当地生态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活的自给自足。而今天,市场经济侵入到怒江山地中,并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为秋那桶村民供了新的“找钱”机会和更丰富的物质消费,但与此同时,也将他们卷入到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之中。固守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还是顺应市场经济去“找钱”?这是人们将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秋那桶村民的生存实践来看,他们一方面在悉心经营着他们的田地和牲畜,努力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一成不变地固守着农耕生活,而是对市场活动抱有极大的热情。在市场的驱使下他们走进大山去挖药材、采菌子,寻找一切可资出售的资源,积极参与到市场交易体系中来。就目前来看,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现在仍是他们的生存基础,但市场经济在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却变得越来越重要。每一种生计模式都给人类群体带来生的希望,但每一种生计模式也都带有其特有的矛盾。在原有的家计经济中,经常要面临着力求自足与实际匮乏的困境;而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弥补他们生活的匮乏,但同时也消解了他们令人羡慕的独立性。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经济组织原则,而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选择。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家计经济视为一种“落后”的经济形式,它对维系人们的生存发展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家计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甚至有可能丧失人们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因此,任何促使少数民族群体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行为都要采取审慎的态度,尽量减轻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承受的文化阵痛。☒

参考文献

- [1] 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 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2] 布罗代尔,著,顾良,译. 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M]. 北京:三联书店,1993.
- [3] 黄应贵. “现代化”下文化传统的再创造(1945—1999)[M].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12.
- [4] 秦红增,韦茂繁. 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与文化变迁[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5] 威廉·埃德加·盖洛,著,晏奎,等,译. 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 [6]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7] 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 农民的终结[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8] 费孝通. 云南三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9]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纂委员会. 怒族社会历史调查[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 [10] Ricardo Godoy, Victoria Reyes-García, Tomás Huanca, et al. Why do subsistence-level people join the market economy? Testing hypotheses of push and pull determinants in Bolivian Amazonia [J]. i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Vol. 61, No. 2(summer,2005).
- [11] 西敏司,著,王超,朱健刚,译. 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12] 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 [13] 安东尼·吉登斯,著,周红云,译. 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14] Ricardo A. Godoy, Michael Gurven, Elizabeth Byron, 2004. Do markets worsen economic inequalities Kuznets in the Bush[J]. in Human Ecology, Vol. 32, No. 3.
- [15] 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 社会分工论[M]. 北京:三联书店,2008.

收稿日期 2013-07-18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温士贤(1982~),河北迁西县人,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2012 级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邮编:510180。电子邮箱:shixian64@163.com。